第 61 卷 第 6 期
2024 年 11 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61, No. 6
Nov. 2024

文 学 研 究

刘禹锡《竹枝词》的经学渊源与政治意涵

吴 夏 平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中唐文人创作竹枝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白居易等人的他者叙事之法,一是刘禹锡以第一人称模拟本地人传唱的写法。刘禹锡《竹枝词九首》突破新乐府传统,其思想当渊源于《公羊传》采诗古义,是对“行人”采诗传统的扬弃和超越。刘禹锡主张用公羊学古义,与中唐新《春秋》学关系密切,是其经学思想在乐府诗学上的实践。从“上达天听”角度看,刘禹锡的创作行为内蕴了对底层社会信息真实性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他去蔽求真的政治理念,与其早年所受江南风习熏染及后来江南任职经验有关。通过刘禹锡《竹枝词》个案,可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认识中唐学术思想、政治观念与诗学实践之间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为研究经学与文学问题提供新方法和新路径。

关键词: 刘禹锡;《竹枝词》;新《春秋》学;经学渊源;政治意涵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I 207.2　　**文章编号:**1000-5919(2024)06-0057-09

《刘禹锡集》卷二七载《竹枝词九首》和《竹枝词二首》。瞿蜕园指出《新唐书》刘禹锡本传、郭茂倩《乐府诗集》、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将《竹枝词九首》系于朗州之误,认为当作于长庆二年刘始到夔州时。对于《竹枝词二首》,瞿《笺》云:“此二首不在前九首之内者,盖与下《纥那曲》词同时所作,《乐府诗集》则并作十一首矣。”①《纥那曲词二首》原注:“右,已上词先不入集,伏缘播在乐章,今附于卷末。”瞿校:“似此数语为唐人编集时所记,而宋时刊本以语气不类而删之。”②陶敏《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将《九首》系于长庆二年夔州时。《二首》置于《九首》之后,从本卷(卷五)系年为长庆来看,可推知陶先生认为《竹枝词二首》亦当作于长庆年间。③ 据此,《九首》与《二首》原非同时所作,宋人编《刘禹锡文集》时并作十一首。以往多将十一首合论,主要集中于情感内容和艺术特征分析,以及作年、作地之考辨等。事实上,《九首》与《二首》不仅作年、作地不同,而且写法也各异。其中《竹枝词九首》与中唐经学关系尤为密切,前人似未曾着意。实际上,刘禹锡《竹枝词九首》深受中唐新《春秋》学思想影响,其创作行为内蕴了深刻的政治意涵。

一、中唐竹枝词创作的两种方法

竹枝词是流行于巴蜀和荆楚等地的民间歌曲。从《全唐诗》所载来看,唐人对竹枝词的关注主要在中晚唐,初盛唐虽有个别诗人提及,但总体上似不大注意。杜甫《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其一:“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④此诗作于夔州,是说李秘书去云安未回,寄诗劝其早日返回夔州,以便一同出峡。可知云安流行竹枝歌。顾况《竹枝曲》及《早春思归有唱竹枝歌者坐中下泪》,提到唱竹枝曲者有巴

收稿日期:2024-01-17
作者简介:吴夏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古书籍制度文献整理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21AZW006)。

①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卷二七,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68 页。
②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卷二七,中册,第 869 页。
③ 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五,第 2 册,北京:中华书局 2019 年版,第 546—556 页。
④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五,第 3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294 页。

人和楚人。张籍《江南行》《送枝江刘明府》,李益《送人南归》,于鹄《巴女谣》,武元衡《送李正字之蜀》等,也记载了蜀楚等地流行竹枝词的情况,可见中晚唐关注竹枝词者渐多。此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竹枝词从巴蜀荆楚向京城长安传播,以至于教坊中有专门传授者。刘商《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写一位少年跟随主人到外地,借唱竹枝词表达思乡之情:“巴人远从荆山客……思归夜唱竹枝歌……曲中历历叙乡土,乡思绵绵楚词古。”①可见随着人的流动,竹枝曲开始向外广泛传播。据孟郊《教坊歌儿》“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能嘶竹枝词,供养绳床禅”②,可知中唐时期竹枝曲已在宫中获得教唱地位,成为当时教坊一支专门曲子。

刘禹锡关注竹枝词,显然与竹枝曲的流行有一定关系。不过,在刘禹锡创作《竹枝词》之前,李涉、白居易等人已有相关创作。据《旧唐书·孔戣传》,元和六年(811)贬太子通事舍人李涉为陕州司仓③。按:宋本《册府元龟》载此事于元和六年闰十二月戊申,“陕州”作“硖州”④。从《全唐诗》所载李涉《竹枝词》“荆门”“巫峡”“昭君溪”“十二峰”等地名,知其贬地当在硖州(今湖北宜昌),而非陕州(今河南三门峡)。据此,李涉《竹枝词》四首作于贬硖州期间。白居易《竹枝词》四首写于通州刺史任上。其《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壶浆椒叶气,歌曲竹枝声”⑤,是说途经江陵听到当地传唱竹枝曲。他在忠州任上所作诗歌,多次提到竹枝曲,如《九日登巴台》《听竹枝赠李侍御》,诗中的“通州司马”是指元稹,可知元稹创作竹枝词要比白居易早。不过,元稹所作竹枝词现无留存,因而据以与刘禹锡比较的只有李涉和白居易各写的四首。

有学者认为,李、元、白、刘的竹枝词创作,“似闻风而争相效”⑥。这个判断尚可存疑,因为元和六年李涉至硖州后创作竹枝词,其时白居易在长安,刘禹锡在朗州(今湖南常德)。白居易赴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在元和十四年(819),此时刘禹锡在连州刺史任上,尚未发现他们此期间有密切的诗歌联系,故“争相效”似不大可能发生。实际情况应是诗人们自发地关注所居之地的风物人情,而又于竹枝词特为瞩目。从这个角度看,不同诗人的竹枝词创作行为,其出发点和思想来源也不尽相同。据李涉《竹枝词》“孤舟一夜东归客,泣向东风忆建溪”⑦,可知诗人虽写硖州风物,但主要是借《竹枝词》以纾郁积,表达思归之情。据白诗“唱到竹枝声咽处”“竹枝苦怨怨何人”“愁杀江楼病使君”“江畔谁人唱竹枝”⑧,可知白居易是叙写听闻竹枝曲的过程。由此可以说,李涉和白居易《竹枝词》都是从旁观者角度来写。这与白居易新题乐府的旁者叙事是一致的。换言之,白居易《卖炭翁》等新题乐府,其内容并非卖炭者所歌,而是诗人从他者视角叙写所见所闻。这种写法以第三人称切入,与以第一人称自叙有本质不同。李涉和白居易《竹枝词》,与刘禹锡《踏歌词》及《隄上行》类似,都是记诗人听闻竹枝曲后的感受。刘氏《踏歌词四首》“唱尽新词欢不见”“灯下妆成月下歌”“新词宛转递相传”“自从雪里唱新曲”⑨“入夜行人相应歌”⑩,与白居易所记听闻竹枝曲的情形正相似。

---

① 刘商:《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彭定求编:《全唐诗》卷三〇三,第 10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3448 页。

② 孟郊:《教坊歌儿》,《全唐诗》卷三七四,第 11 册,第 4200 页。

③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五四《孔戣传》,第 13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4097 页。

④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五三《帝王部》“明罚第二”,第 1 册,影宋本,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288 页。

⑤ 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74 页。

⑥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卷二七,中册,第 857 页。

⑦ 李涉:《竹枝词》,《全唐诗》卷四七七,第 14 册,第 5429 页。

⑧ 白居易:《竹枝词》四首,《白居易集》卷十八,第 388—389 页。

⑨ 刘禹锡:《踏歌词四首》,《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六,中册,第 815—816 页。

⑩ 刘禹锡:《堤上行三首》,《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六,中册,第 808 页。

中唐新题乐府是对齐梁以来乐府传统的反拨。齐梁时期,乐府开始出现新潮流,最突出的一点是多赋题中之物。吴兢曾指出其“断题取义”之弊:“赠夫利涉,则述《公无渡河》;庆彼载诞,乃引《乌生八九子》;赋雉斑者,但美绣颈锦臆;歌天马者,唯叙骄驰乱蹋。”①这种赋题乐府,专事题中之物的形态描摹,已远离乐府本义。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以新题写时事的方法纠其纰缪,使其从尚形和尚辞的齐梁旧习中脱离出来,复归尚事和尚义传统。这就形成了中唐新乐府的叙事传统。② 白居易新乐府诗多从他者视角叙事,其渊源正在于此。白居易《竹枝词》本质上也属于新乐府叙事传统,其以第三人称叙写闻观感受,体现了尚事与尚义结合的特点。而刘禹锡《竹枝词》在此传统之外,开辟了一个新写法。其《竹枝词引》说:

>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昔屈原居湘、沅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③

按:《诗·卫风·淇奥》,小序云“美武公之德也”④。刘禹锡所解与此不同,认为《淇奥》是写男女之情的民歌,故称其“含思宛转”。但刘序重点不在于此,而在“知变风之自”。这里的“变风”,是指相对于纯正的民歌正体而言的拟作。所谓民歌正体,是指当地人传唱的竹枝词。这里的“自”,是指竹枝曲所出源头。此句意思是,后人听到这些拟作的《竹枝词》,应知是刘禹锡所创,就像后人听《九歌》,知道是屈原模拟楚人所作的一样。因此,其《竹枝词》仿屈原作《九歌》,以模拟本地人传唱为主要特点。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均模拟本地人自唱口吻。通观九首,显然都是从夔州当地传唱竹枝曲者的视角来写,其内容以男女情感为主,如“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之类,间或描摹夔州风物,如白帝城、白盐山、瀼西水、昭君坊、永安宫、滟滪堆、巫峡雨等⑤。但刘禹锡又明显意识到,拟作毕竟还不是本地人所唱的竹枝曲,所以在序中称此九首为“变风”,以示与“正风”有别。刘禹锡《竹枝词二首》其二:“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⑥从“今朝北客思归去”来看,这二首似是诗人将离开南方时所作。“纥那”是当时流行于北方的曲调,刘禹锡对此有描述:“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周郎一回顾,听唱纥那声。”“踏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⑦将纥那曲与杨柳曲、竹枝曲并列,表明纥那曲也是一种和声踏歌曲。“回入纥那披绿罗”意思是,待诗人回到北方,用纥那曲的曲调来唱竹枝词的歌词,应别具一番风味。由此可见,《二首》的写法与《九首》不同。“巴人能唱本乡歌”是从旁观者角度切入,与白居易《竹枝词》旁者叙事相同。

据上述可知,唐人创作《竹枝词》情况比较复杂,李涉、白居易、刘禹锡等人虽都作有《竹枝词》,但写法各异,即便同一人如刘禹锡也有不同写法。《竹枝词九首》以第一人称叙事,突破新乐府传统,固然有追摹屈原的意思,但究其本质,当渊源于刘禹锡对《公羊传》采诗古义的理解。

二、刘禹锡《竹枝词》与《公羊传》采诗古义

上古“采诗”之说,《汉书·食货志》记为:“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

①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4 页。
② 吴夏平:《史学转向与唐代“文之将史”现象》,《文学评论》2019 年第 3 期。
③ 刘禹锡:《竹枝词并引》,《刘禹锡集笺证》卷二七,中册,第 852—853 页。
④ 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卷三之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20 页。
⑤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其二,《刘禹锡集笺证》卷二七,中册,第 852 页。
⑥ 刘禹锡:《竹枝词二首》,《刘禹锡集笺证》卷二七,中册,第 868 页。
⑦ 刘禹锡:《纥那曲词二首》,《刘禹锡集笺证》卷二七,中册,第 869 页。

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①《公羊传》“宣十五年”传文亦载:“五谷毕入,民皆居宅……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②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班书与《公羊传》有两点相同:一是所采之诗均为民间歌诗,二是所采之诗均献于天子。相异之处亦有二:一是《公羊传》所记采诗时间为“五谷毕入”的冬闲季节,班书则记为“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之时。颜师古释“将散”为“各趣农晦”③,可知是农忙季节。二是《公羊传》中的采诗者为“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班书则记为“行人”。颜师古释“行人”为“遒人也,主号令之官”④,也就是派遣至各地的宣令官。按:班固或合《尚书》与《公羊传》而言。考《夏书·胤征》:“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⑤孔颖达疏称《周礼》无“遒人”,似别置之官。《公羊传》中的采诗者为无子女的老年人,对民间疾苦有切身体会,而《汉书》所记采诗者为发布政令的官员,奉王命行事,对民间疾苦较为隔膜。据此可知,《汉书·食货志》与《公羊传》根本区别,在于对采诗过程的不同理解。《公羊传》强调所采之诗的原生态,也就是当地人传唱的未经加工改造的原始民歌。而《汉书·食货志》则强调由官员收集民歌,经太师“比其音律”加工改造,再献给天子。则其献给天子的歌诗已非原初形态,而是经官员改编,或叙述其听闻的诗歌。

《后汉书》所载《白狼歌》三章,反映了《汉书·食货志》所言采诗献诗过程,或有助于对汉代采诗风习的理解。汉明帝刘庄永平(58—75)年间,益州刺史朱辅好立功名,西南白狼王唐菆等部落慕义归化,作诗三章,献于朝廷。朱辅令犍为郡掾田恭将“夷”语歌辞翻译成汉语,又遣从事史李陵与田恭一同护送唐菆等至京城洛阳,上其乐诗,“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⑥。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于此下注云:“《东观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言,今范史所载者是也。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也。”⑦根据李贤此注,可知朱辅所采《白狼歌》三章,曾为当时东观收录。《东观汉记》先载本语,亦即汉语记音的“夷”歌,再以汉语将“夷”歌意译为“华言”。从李贤所说“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以及范史所载仅“华言”,可知今本《后汉书》中汉语记“夷”音的“本语”是李贤等人据《东观汉记》补录的。唐菆等进献歌诗一事,《后汉书·明帝纪》记在永平十七年(74):“是岁……西南夷……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⑧今本《后汉书》载《远夷乐德歌诗》14 句,《远夷慕德歌诗》14 句,《远夷怀德歌》16 句,每章先记汉译歌辞,再记汉语记音的“夷”语歌辞。如《远夷乐德歌诗》前四句“大汉是治。堤官隗构。与天合意。魏冒踰糟”⑨,其中“大汉是治”“与天合意”是汉译歌辞,“堤官隗构”“魏冒踰糟”是与汉译歌辞对应的汉语记音“白狼语”歌辞。经由采诗和献诗等一系列活动,保存在史书中的歌辞已非其原始面貌,其间发生多重隔碍。第一重“隔”,发生于“夷”语《白狼歌》与汉语记“夷”音的《白狼歌》之间。其中既有不同语言之间的隔阂,也有由于记音技巧等原因形成的隔碍。当然还存在汉语记音者主观意图等原因形成的“隔”。例

① 班固:《汉书》卷二四上,第 4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123 页。
②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287 页。
③ 班固:《汉书》卷二四上,第 4 册,第 1123 页。
④ 班固:《汉书》卷二四上,第 4 册,第 1123 页。
⑤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57 页。
⑥ 范晔:《后汉书》卷八六,第 10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854 页。
⑦ 范晔:《后汉书》卷八六,第 10 册,第 2856 页。
⑧ 范晔:《后汉书》卷二,第 1 册,第 121 页。
⑨ 范晔:《后汉书》卷八六,第 10 册,第 2856 页。

如,《远夷乐德歌诗》汉语记“夷”音中的“罔驿刘脾”①,《远夷怀德歌》中的“罔译传微”②,都突出了译者本人对宣扬大汉盛世的作用,显然是译者有意改动的,原始形态“白狼语”版本《白狼歌》未必如此。第二重“隔”,发生于“华言”版《白狼歌》与汉语记“夷”音版《白狼歌》之间。这主要受译者立场和翻译能力影响,译者汉语水平和“夷”语水平都影响“华言”译文的准确度,译者的“汉人”立场,自然也影响“华言”版《白狼歌》文本的形成。第三重“隔”,发生于《东观汉记》版《白狼歌》与唐菆等部落进献的《白狼歌》之间,这主要受史官对歌词润色的影响。因此,最后写定的载录于官方史书中的《白狼歌》三章,与当时流传于唐菆等部落“白狼语”版《白狼歌》之间应有较大差距。

由《白狼歌》之例可知,《汉书·食货志》所记采诗之法,经由“行人”采集、太师“比其音律”后献给天子的歌诗,已非民间歌曲的原始面目。白居易等人新题乐府深受“行人”采诗之义影响,故白氏等人乐府诗从旁观者角度叙事,已非所叙之事本身的第一义,正如《白狼歌》三章一样,也存在与原始歌诗相隔的弊病。刘禹锡充分认识到新乐府在信息传播中的隔碍和遮蔽问题,曾指出“阅天数而视民风,百态变见乎其间。非耳剽以臆说兮,固幽永而纵观”③,认为天子体察民间疾苦,应了解真实情况,而非“耳剽”“臆说”的民情。那些经文人转叙的歌诗,或臣子奏章中的信息,大多已被选择、被过滤,可能有乖事实。刘禹锡本人也创作了不少新题乐府,这是他与元白诸人的相通处。但刘禹锡意识到,这些新题乐府多从他者角度来写,虽标举“歌诗合为事而作”④,但并非“饥者”“劳者”的原声,而是对“讥”“劳”之人所历之事的叙述,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耳剽”“臆说”的选择性遮蔽。刘禹锡摒弃“行人”采诗传统,直承《公羊传》采诗古义而创作《竹枝词九首》,目的是为了去除新题乐府可能存在的选择性遮蔽,从而保证所采信息可靠,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从这层意义说,《竹枝词九首》具有乐府诗学自我纠弊的意义。白居易《忆梦得》:“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题下原注:“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⑤据此可知,刘禹锡不仅能制作竹枝词,而且还能唱竹枝曲。其唱曲行为,颇有模仿《公羊传》采诗献诗口传仪式的意味。由此可知,在思想渊源上,刘禹锡创作《竹枝词九首》显然受到《公羊传》影响。而对所采信息去蔽的强调,又蕴涵了他求真务实的政治理想。这两种思想意识的来源,均与中唐经学新变有关。

三、刘禹锡与中唐新《春秋》学

刘禹锡与中唐新《春秋》学关联的表现,除上述主张以《公羊传》采诗古义仿写民歌之外,还表征于他对《谷梁传》的喜好。例如,《观博》“自朝至于日中稷”,自注:“稷,昃也。《谷梁传》。”⑥此处“稷”字,义与“昃”同。“日中稷”即“日中昃”,意思是太阳偏西之时。“稷”是《谷梁传》的专门用法,如《谷梁传》“定十五年”:“日下稷,乃克葬。”⑦此处“日下稷”,《左传》作“日下昃”。再如《观市》“郡守有志于民”⑧中的“志”字,其义与《谷梁传》“僖三年”中“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⑨中“志”字同,亦即关心民事。此外,刘氏以经语入文,亦常用其新义。如为杜佑所撰《谢春衣表》“在身不称,恐招鹈翼之讥”⑩,

---

① 范晔:《后汉书》卷八六,第 10 册,第 2856 页。
② 范晔:《后汉书》卷八六,第 10 册,第 2856 页。
③ 刘禹锡:《楚望赋》,《刘禹锡集笺证》卷一,上册,第 14 页。
④ 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集》卷四五,第 962 页。
⑤ 白居易:《忆梦得》,《白居易集》卷二六,第 604 页。
⑥ 刘禹锡:《观博》,《刘禹锡集笺证》卷二〇,中册,第 533 页。
⑦ 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一九,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446 页。
⑧ 刘禹锡:《观市》,《刘禹锡集笺证》卷二〇,中册,第 535 页。
⑨ 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七,第 2392 页。
⑩ 刘禹锡:《谢春衣表》,《刘禹锡集笺证》卷一二,上册,第 312 页。

“鹈翼”即用施士匄所主掠美之义。《上淮南李相公启》“南箕播物,不胜曷言”①,采施氏之说,代指小人不能复恣播弄是非。《秋萤引》“高丽罘罳过珠网,斜历璇题舞罗幌”②之“罘罳”,解作屏障,亦用施氏新说。③

刘禹锡推崇《春秋》公羊学和谷梁学,尤钟情于《诗》《礼》新释。何以如此?若简单归因于诗人对今文经学的喜好,似亦能通。但若将之置于整个唐代经学发展史来考察,则事实又并非如此。自东汉至初盛唐,古文经学兴盛,今文经学则退居其次。初唐重新整理“五经”,所取诸书,除《周易正义》采王弼注稍显今文经学外,其余四种经文注本均取自古文经学。就《春秋》研究而言,初盛唐时期《左传》研究者相对较多,在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之外,还有阴弘道、王玄度、徐文远等人的著述。《谷梁传》仅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公羊传》则似未有专门研究。而“三传”综合研究,仅有王玄感《春秋振滞》及卢藏用《春秋后语》。这些情况,与开元十六年(728)国子祭酒杨玚上表所称“《公羊》《谷梁》殆将废绝”④正相符契。韩愈也说:“近世公羊学几绝。”⑤可知在中唐之前,古文经学确实有比较大的发展,而今文经学则明显居于劣势。这种情形的改变,发源于天宝末啖助对《春秋》三传的会通研究。啖助去世后,其经学思想传播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在江南,另一条在长安。《旧唐书·窦群传》:“群独为处士,隐居毗陵……后学《春秋》于啖助之门人卢庇者,著书三十四卷,号《史记名臣疏》。”⑥可知在江南一带,啖助之学并未因其去世而湮灭。不过,对啖氏《春秋》新学产生重大传播影响的,还是陆淳北上。陆淳于兴元元年(784)至贞元十六年(800)长期在京任职,贞元二十一年(805)又从贬所重返京城,前后居长安约二十年⑦,期间以著书授徒等方式发扬啖助经学思想。

刘禹锡与中唐新《春秋》学关联,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是早年随其父刘绪生活于江南而受新学熏染。《旧唐书》刘禹锡本传云“世以儒学称”⑧,《新唐书》本传亦称“世为儒”⑨。刘绪天宝末应进士试未中,长期在浙西幕府任职,曾任盐铁副使,主务于埇桥(今安徽宿州)。啖助天宝末曾任临海尉,后转丹阳主簿,秩满屏居,潜心经学。刘绪任职浙西幕府时,当与啖助等人有所交往。浙西节度使始置于肃宗乾元元年(758),治升州,后徙治苏州。上元二年(761),徙治宣州。建中元年(780)合浙江东、西二道,徙治润州。贞元三年(787),徙浙江东、西二道,浙西治所改为苏州。浙西节度使治所虽屡经改易,但润州则始终为其所领州之一。临海属台州,丹阳属润州。⑩ 刘禹锡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之前,长期随父生活于江南,应受啖氏《春秋》学江南一脉之濡染。

刘禹锡与新《春秋》学联结的第二条线索,是他在长安与主张新学者如施士匄、陆淳等人密切交往。据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刘禹锡曾与柳宗元、韩愈同听施士匄讲《毛诗》。⑪ 又据韩愈《施先生墓铭》,施士匄卒于贞元十八年(730)十月⑫,可知三人同听施氏讲《毛诗》一事,实发生于贞元十七八年间。《新

① 刘禹锡:《上淮南李相公启》,《刘禹锡集笺证》卷一八,上册,第 453 页。
② 刘禹锡:《秋萤引》,《刘禹锡集笺证》卷二一,中册,第 583—584 页。
③ 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附录一《刘宾客嘉话录》“施士匄说毛诗”条,第 6 册,第 2316 页。
④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五下《杨玚传》,第 15 册,第 4820 页。
⑤ 韩愈:《答殷侍御书》,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9 页。
⑥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五五《窦群传》,第 13 册,第 4120 页。
⑦ 杨慧文:《陆质生平事迹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3 期。
⑧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〇《刘禹锡传》,第 13 册,第 4210 页。
⑨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六八《刘禹锡传》,第 16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128 页。
⑩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六八《方镇表五》,第 6 册,第 1903—1910 页。
⑪ 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附录一《刘宾客嘉话录》,第 6 册,第 2316 页。
⑫ 韩愈:《施先生墓铭》,《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第 350 页。

唐书·儒学传》称大历以《诗》名家者施士匄等,“最卓异”①。施氏解《诗》,好为新说,体现为“舍传求经”的特点。施士匄亦为吴人,在吴地生活多年,其经学或受啖助启发。韩愈、柳宗元青年时期都曾游历江东,对施士匄或早有所闻,故后来与刘禹锡结伴听讲。

刘禹锡与陆淳交往,主要通过韦执谊和柳宗元等人。据杜牧所撰牛僧孺墓志:“故丞相韦公执谊以聪明气势,急于褒拔,如柳宗元、刘禹锡辈,以文学秀才,皆在门下。”②可知刘禹锡、柳宗元都曾得到韦执谊赏识,并由此得以交往当时力主改革的其他人。执谊之子韦绚后来跟随刘禹锡问学于夔州,其源在此。《旧唐书·王叔文传》:“(叔文)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与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又因其党以进。”③传中提及之人,直接或间接受啖助经学影响,在长安任职期间,又与陆淳密切交往,对啖、陆经学有更深理解。由此可以说,贞元时期京城长安的经学氛围,特别是韩愈、柳宗元等人对《春秋》新学的推崇和研究④,激发了刘禹锡研习新学热情,而其与施士匄、陆淳等人密切交往,又使他对《春秋》学新义有更深入认识。

《春秋》新学核心要义,赵匡曾总结为“兴常典”与“著权制”两点。⑤ 简言之,“兴常典”为正,“著权制”为变。赵匡认为啖助《春秋》学精义,即会通正变、守正知变。陆淳继承啖氏经学思想,并进一步发挥。如引啖助之说解释“春秋”命名涵义:“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又说:“是故《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⑥可见陆淳在啖助会通正变基础上,更强调因时从宜、“革礼”“救弊”的重要性。传统论啖、赵、陆的经学思想,多强调其“异”的一面,较少提及因时因事而权制、力主改革的一面。从五代刘昫、宋代朱临、元代吴莱,到清代朱彝尊、四库馆臣⑦等,莫不如此。他们不提这一点,并非没有看到《春秋》新学要义,很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而不便言及。但在当时,这种变革思想对刘禹锡启发意义重大。刘氏崇尚公、谷之学及《诗》《礼》新释,其吸引力不仅在思想之新,更在于该思想与中唐现实关联密切,为解决当时社会矛盾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这种观念在当时甚为流行。事实上,受啖助、陆淳等人影响,中唐《春秋》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时究三传异同者,仅两《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载,就有冯伉、刘轲、韦表微、韩滉、樊宗师等著述,以及元和十三年(818)国子监修定《春秋加减》等十余种。此外,尚有殷侑注《公羊春秋》⑧,卢仝《春秋摘微》⑨,以及高郢的相关论述⑩。由此可知,刘禹锡《竹枝词九首》用《公羊传》采诗古义,其思想渊源于中唐《春秋》新学的全面转向。

四、《竹枝词》与刘禹锡的政治理念

刘禹锡创作《竹枝词九首》,扬弃“行人”采诗传统,主张恢复《公羊传》“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古义,显然受了中唐啖、陆等人《春秋》新学影响。可以说,《春秋》新学为刘禹锡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竹枝词》创作是其对《春秋》新学思想的诗歌实践。这种诗歌实践同时又是其政治理念的反映,是其政

---

①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〇〇《儒学传下》,第 18 册,第 5707 页。

② 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并序》,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七五五,第 8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7825 页。

③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第 11 册,第 3734 页。

④ 吴夏平:《试论中唐“六经皆文”观念的生成》,《文学遗产》2016 年第 6 期。

⑤ 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83 页。

⑥ 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 册,第 379 页。

⑦ 参见《春秋集传纂例序》《春秋集传纂例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 册,第 376—378 页。

⑧ 韩愈:《答殷侍御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第 209 页。

⑨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08 页。

⑩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七《高郢传》,第 12 册,第 3975 页。

治实践的重要表现。这是因为,刘禹锡在民歌仿习中提倡公羊学古义,本质是对采诗传统政治功用的思考,亦即对底层社会信息真实性问题的思考。刘禹锡之所以力主回归古义,是因为公羊学采诗古义重视底层社会信息的原生形态,因而更为真实可靠,而“行人”采诗传统则有可能出现信息遮蔽问题。据此可以说,刘禹锡主张以公羊学采诗古义仿习民歌,是其求真务实政治理念的社会实践。这种观念的形成,在新《春秋》学影响之外,还与中唐以江南士人为代表的政治革新精神有关。

刘禹锡主张以《公羊传》古义实践于《竹枝词》创作,其中内蕴去蔽求真的政治革新思想,虽发生于唐穆宗长庆期间,但其形成却早在诗人的青少年时期。刘禹锡自幼生活于江南,后来又任职于江南,深受中唐社会转型时期江南士人精神影响。其关键人物是刘晏。唐代宗以刘晏总理盐铁、转运、铸钱、租庸等事务,而扬州、淮南尤为重中之重。刘晏的财赋改革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充分认识到国家财赋与政治稳定的重要关系,将财赋工作提升到政治高度。面对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危机,刘晏提出:“诸将有不廷,戎虏有侵盗,闻我贡输错入,军食丰衍,可以震耀夷夏。”①亦即认为国家经济强盛对藩镇和外族具有强大震慑力。二是强调财赋信息的真实性和透明度。《新唐书》指出刘晏之所以成功,是因其以吏“奉行文书”,而以士人“检劾出纳”②,使“文书”与“出纳”二者互不统属,从而去除因信息隐蔽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很显然,这种改革思想深刻体现了求真务实精神。

刘禹锡家族与刘晏之间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刘晏故吏之一卢徵,即刘禹锡之舅父。③ 大历年间,刘禹锡父亲刘绪曾在浙西卢元甫幕中任职,因卢徵引荐而为刘晏擢用,被任命为盐铁副使,主务于埇桥。刘禹锡进士及第后,曾入杜佑浙西幕任掌书记。刘绪在浙西韦元甫幕时曾与杜佑为同僚,刘禹锡入杜佑幕,当与此有关。这可以说是刘禹锡家族受刘晏直接影响的一面。

刘禹锡还受刘晏思想的间接影响。自贞元十六年(800)至二十一年(805)的五六年中,刘禹锡实际参与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种具体实务,显示出其突出的实干才华,并且凭借这一能力,得以结交王叔文等人。前引《旧唐书·王叔文传》中提到的韦执谊等人,不仅在经学上多受啖、陆影响,而且在地缘上还多与江南有关。例如,王叔文占籍越州(今浙江绍兴),曾任苏州司功参军。王伾是杭州人,史载其“貌寝陋,吴语”④。韩晔族叔韩滉曾任镇海节度使、浙江东西观察使。程异曾任扬州海陵主簿,贞元末以虞部员外郎充盐铁转运、扬子留后。凌准曾任浙东观察判官,贞元二十一年(805)春入为翰林学士。也就是说,这份名单所载者,或为江南本地人,或曾在江南任职,直接和间接地与江南产生关联。正因为他们大多有江南经历或任职体验,故而在政治理念上深受刘晏影响。史载王叔文微时,尝言“钱谷为国大本,将可以盈缩兵赋,可操柄市士”⑤,可见他对财赋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实与刘晏相通。陈谏推崇刘晏改革思想,认为其成功的关键是抓住了发展生产与增加财赋的辩证关系⑥。除思想上受刘晏影响外,这些人还实际担任国家财赋工作。如韩晔族叔韩滉,大历六年(771)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与刘晏分领诸道财赋。韩泰曾任户部郎中,善于筹画,故深为“二王”倚重,付以京城守卫重任。程异贞元末任盐铁转运、扬子留后,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而刘禹锡本人,贞元后期曾在扬州杜佑幕中任职。很显然,刘禹锡的江南任职经历,及其后来京城任职期间与上述人员的密切交往,使他在政治理念和实务操作等方面,都深受刘晏务实思想影响。

---

①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第 15 册,第 4794 页。

②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第 15 册,第 4795 页。

③ 参看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卷三十《途次敷水驿伏睹华州舅氏昔日行县题诗处潸然有感》,中册,第 1003—1004 页;《外集》卷三《贞元中侍郎舅氏牧华州时予再添科第前后由华觐谒陪登伏毒寺屡焉亦曾赋诗题于梁栋今典冯翊暇日登楼南望三峰浩然生思追想昔年之事因成篇题旧寺》,下册,第 1195—1196 页。

④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五《王伾传》,第 11 册,第 3736 页。

⑤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第 11 册,第 3734 页。

⑥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第 15 册,第 4797—4798 页。

相近的经学旨趣,为他们交往提供了重要的价值观念基础。类似的江南任职经历,使他们易产生身份认同之感。而对刘晏财赋改革思想的推崇和学习,又使他们对国家治理产生较一致的看法。刘禹锡与上述人员多有交往,自然声气相应。贞元末,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屯田员外郎隶属工部,但刘禹锡实际参与的是户部度支的财赋工作。可见刘禹锡通达治理、洞悉利弊,与其江南任职及担任判度支盐铁等经历有重要关系。应当说,他在遭受贬谪离开长安之前,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国家治理观念,特别是对信息遮蔽现象及去蔽方法,有自己独特思考。他在朗、连、夔、和、苏、汝、同等州任职,积极关注民生,发展当地经济,其实都是他去蔽求真政治理念的社会实践。刘禹锡从信息传递角度重新理解采诗传统,是他对社会信息真实性以及信息传播渠道等问题思考的结果。白居易等人固守“行人”采诗传统,将自己身份类比于上古“遒人之官”,内蕴了“采诗官”的角色意识,因此所传递的信息难免隔碍。而刘禹锡则化作最底层民众,努力保持所传信息的原生本色,从而超越“行人”采诗传统。他对采诗的社会和政治功能的重新认识,实与他早年所受江南风习熏染,以及后来江南任职经验有密切关系。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rigin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iu Yuxi's Bamboo Branch Lyrics

Wu Xia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scholars of the Mid-Tang Dynasty mainly had two methods to create *Bamboo Branch Lyrics*. One was the method of the other's narrative by Bai Juyi (白居易) and so on, and the other was Liu Yuxi's (刘禹锡) way of imitating the singing of local people in the first person. Liu Yuxi broke through the New *Yuefu* (乐府) tradition in his *Nine Bamboo Branch Lyrics* (《竹枝词九首》). Its thought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meaning of collecting poems in *The Gongyang Commentary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公羊传》), and it was a subla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messenger" tradition of collecting poems. Liu Yuxi advocated the use of *the Gongyang Commentary* to study ancient meanings, which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ew study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This was the practice of his Confucian classics ideology in *Yuefu* po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 sending messages to the emperor " (上达天听), Liu Yuxi's act of creation contained his thinking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messages about the bottom society and reflected his political idea of eliminating the falsehood and seeking the truth, which wa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Jiangnan (江南) made upon him in his early years and the working experience gained by him when he took office in Jiangnan later. Through the case of Liu Yuxi's *Bamboo Branch lyrics*,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and know about the intricate linkag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thought, political idea and poetics practice in the Mid-Tang Dynasty, and provide a new method and a new path for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literature.

Key words: Liu Yuxi (刘禹锡); *Bamboo Branch Lyrics* (《竹枝词》); new study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onfucian classics origin; political implication

(责任编辑　郑　园)